

## 似水流年

## 人民助学金助我学业有成

1950年冬,老家农村取缔私塾,建立学校,国家为每个行政村派了正式的人民教师。那时,青少年文盲多,有的人家穷,总以为读书无用,就让孩子帮家里干活,入学的不多。我大伯是村教育委员,就带头把6岁的我和二伯家的堂姐送到学校凑数。30多名学生,大的20

来岁,小的六七岁。根据每个学生的年龄和智力水平分成4个年级,在一间教室轮流上课。学生们没有书包,用小木匣装文具,抱着匣子上、下学,使用的是毛笔和铅笔。每天下午放学,值日生小组都登梯子上到房顶,用自制的广播喇叭喊话搞宣传。不久,国家统一改寒假后开学升级为暑假后开学升级,为此,我多念了半年初小。我们上学没交过学费,课本、文具费总共花了两万多元(那时的1万元相当于后来的1元)。

1955年秋,我进村西南4公里外的本乡中心小学读高小。走读没几天,家乡因有计划地成为蓄洪区而“发水”了。再去学校,路上需要4个小时。走读已不再可能,同学们就寄宿在各自的亲戚家,在学校开伙。学生的饭也简单,高粱面饽饽、萝卜咸菜,“稀饭”是贴饽饽锅里的“留锅”水。我们每两周回家一次,背回高粱面和家里腌制的咸菜。因为想家,吃的不好,短短两年的高小生活,我觉得很漫长。上高小同样没交过学费,除了课本、纸张、铅笔、橡皮,再无花费。两年高小,花了不到4元钱(人民币已改为新版)。

1957年夏,我高小毕业。那时,小升初还不是统考统招,由各中学自行组织招生考试,择优录取。各校招考日期不一,考生可以像赶集一样参加多个

学校的招生考试。那年,我们村6名高小毕业生只有两人去参加升学考试,仅我一人考上。我们乡108名高小毕业生,也只有两人考入初中。

初中三年,我们赶上了“反右”“大跃进”“大炼钢铁”,实行“劳动卫国体育制度”(简称“劳卫制”,每周上5天课,劳动2天;初、高中不同年龄的学生在综合体育项目上分别达到一级、二级劳卫制标准,单项分别达到少年级运动员、3级以上运动员标准)。1959年,欢度新中国“十年大庆”后实行粮食定量,接着进入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坚持“低标准,瓜菜代”和劳逸结合,每天只吃两顿饭。

1960年秋,我被本校保送入高中。高中三年相对平静。虽然在“困难时期”,但师生们精神饱满,教学秩序很好。校园面积大、设施全、环境美,师资力量雄厚。我们在科学馆的实验室里上理、化、生物课,中学阶段就接触到激光等高端科技知识。中学的学费,一学期要好几十元。对寒门学子来说,那可是个大数。学生凭城镇街道居民委员会或农村生产大队开具的“家庭生活困难”介绍信,就可免除。我从来都是交介绍信,所以不记得学费的具体金额。吃饭,每月6元伙食费,其中2元是菜金。就这区区6元钱,家里也拿不出来。我几次因为断炊

而要求退学。每次老师都耐心劝导、挽留,许诺为我增加助学金,直至每月增至8元。6年中学读下来,我家的花销不到100元钱。

1963年,我考入北京大学。学校实行革命化教学,学习紧张,压力很大。党和政府关怀大学生,我一入学,给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由12.5元增加到15.5元,教室里荧光灯的亮度也增加了。大学学费更高,我仍是凭老家的介绍信获免。每月15.5元的伙食费,由人民助学金转移支付。助学金分为3等,我申请了一等的15.5元。理发、洗澡、牙膏、肥皂、看电影、交通等日常生活费用,另有一项助学金,也分为3等,分别为每月4元、3元和2元。我有资格申请一等,却只申请了二等,是为了约束自己节俭,为国家每月节省1元钱。学生只要从居委会开来家庭人均收入8元以下,或生产大队关于家庭人口、劳动力数和年终决算工分值的证明,就有资格申请助学金。还有几项专项助学金,如春游、配眼镜、购置特别文具和其他特殊需要等等。这些项目,我从未申请过。大学期间,不算穿衣,家里为我的付出总共不过100元。

我是靠人民助学金读完大学的。所以,我终生不忘勤勤恳恳地工作,以报答党和人民的培育之恩。

李维德/文

## 最后悔的一件事

我读初一那年是1980年。那时,乡下外语教师奇缺。学校把附近村庄一个刚初中毕业的王姓年轻人找来,教我们这帮农家子弟。

王老师刚来时有些胆怯,在讲台上窘态百出,让我们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大为振奋,课堂上我们大声喧哗,出他的洋相:他让我们读课文,我们就洋腔怪调地应付他,于是,他一遍遍地纠正我们的发音。再有耐心的人,也很难坚持下去,他终于发火了,脸憋得通红,额上的青筋都露了出来。

下课后,我们几个小伙伴商量还击王老师的策略。有人提议,把墨水洒到他身上。又到了上外语课的时间,我把一瓶敞开盖子的蓝墨水放在了虚掩的教室门上方。我们几个趴在窗户上静候着王老师,他步履轻快地走来了,我们赶紧各就各位。当门被推开的时候,墨水瓶准确地砸了下来,整瓶墨水洒在他干净的衣服上。我们哈哈大笑起来。

事情发生后,王老师坚决辞去了代课教师职务,回家种田了。

没想到,长大后,我成为一名教师。直到踏上讲台,我才明白了做教师的酸甜苦辣和期盼学生成才的迫切心情。我常常想起那件荒唐事,总想找到王老师向他道歉,但我一直没有勇气。

马玉顺/文

## 朝花夕拾

## 坑道遇险

1958年,我们步兵189师奉命停止军训,到秦皇岛抚宁进行国防施工。

当时,我在567团7连下连当兵,我们连的任务是在秋月山掘进坑道。因为是在山的向阳面施工,山石干燥,所以开始没有被复,也没有塌方现象。掘进中期,我们班在掘进时突然出现了塌方,班长张志强被一堆碎石砸了脚面,两个脚指被砸断。接着,我头顶上方有一块10多公斤的大石头突然掉落,幸运的是,石头下面一根碗口粗的竹竿挡了一下,大石头改变了掉落方向,才没有掉到我头上。

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让全连提高了警惕,连长刘长久马上调运木材,把掘进的坑道全部被复起来。从此,再没有发生过伤人事故。

银海/文

## 图说往事

## 带头无偿献血

从1998年10月1日起,我国开始实行无偿献血。当时,我在解放军260医院工作。我是这一政策的积极倡导者,也是医院实施无偿献血的组织者、实践者。我院要求符合条件的人员全部参加无偿献血,所以,我带头第一批到河北省血液中心献血,献血后发给我一本无偿献血证。图为我当时献血的情景。

白和平/文并供图



## 军旅生涯

## 班长演唱我拉琴

1964年9月,我应征入伍,来到辽宁本溪驻军某部榴弹炮营侦察班,当上了计算兵。

新兵要有老兵带。我是班里唯一的一名新兵,带我的任务落在班长董方山的肩上。董班长是河南人,他当时已入伍六七年了,但乡音未改,唱豫剧特别有风味。在欢迎我到来那天的班务会上,董班长在掌声中唱了段豫剧《谁说女子不如男》,伴随着优美高亢的曲调,我拉过手风琴的双手,不由自主地做出弹琴键的动作,被班长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。

1964年,部队正搞“大比武”,“冬练三九,夏练三伏”的口号响彻军营,全军掀起大练兵的高潮。我们侦察班早出晚归,夜间还要搞捕捉目标演习,大家都很疲劳,但每次训练结束,董班长总要带战友一起唱《打靶归来》,给我们加油鼓劲。得知我会拉手风琴,一次营部月未开晚会,董班长特意从二

连借来一部手风琴,让我为他伴奏。那一次,他唱了两首歌和一段豫剧。从此,经常是班长演唱我拉琴,我俩成了榴弹炮营排练节目的最佳搭档。

一天,我俩相约到照相馆照张合影。可是到了照相馆门口,他说自己头发长,让我自己照。这怎么行呢?因为照相前,我已想好了照片题字“班长演唱我拉琴”,我一人独照,与题字不符,就这样,照相的事就撂下了。虽然我俩没有留下合影,但班长当年的神态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孙连杰/文

## 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

图说  
核心价值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节俭传下去 中国更幸福

河南舞阳 张歌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